

民国史家與史學

民国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12-1949

陈勇 主编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上海大学出版社

民国史家与史学

(1912~1949)

民国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 勇 主编

上 海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史家与史学 / 陈勇主编.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71-1268-1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史学家-中国-民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0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写(2014)第082084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章 斐

民国史家与史学(1912~1949)

陈 勇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WW STUDIO 制版

江苏德浦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25 字数 843 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268-1/K·124 定价: 98元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B类)世界史资助

民国史家与史学(1912~1949)

主 编 陈 勇

编委会成员

陈 勇 秦中亮 宋红宝

范玉亮 周天雨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CONTENTS | 目录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朱发建/001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	陈 勇 范玉亮/008
南高学派与学衡派的学术关联	吴忠良/016
“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思潮的早期演变	雷 平/028
现代国学思潮走向的再省思	胡逢祥/036
走向民国之际的中国国粹思潮及与日本的比较	盛邦和/048
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	
——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陈 峰/055
唯物史观初入中国时期的诠释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考察	何爱国 颜 英/066
感受力的隔绝	
——论民国史家造成的一种制度性能力缺失	章益国/074
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	谢贵安/083
《地学杂志》与一次大战前后中国人的世界观	韩子奇/096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	
——《禹贡》半月刊“专号”的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 ...	王记录 林 琳/109
“融化旧粹,发扬新猷”	
——探讨陈训慈西洋史地知识资源	区志坚/122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汪洪亮/137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西南研究	王 传/148
基于史学视野下的我国近代学校历史教育史研究试探 ...	陈 辉 王 川/160
以社会价值为导向:民国历史教育的新动向	朱梅光/169
现代大学中国史学史教育检视	王应宪/176



民国年间史家与国际汉学界的互动	朱政惠/185
“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李孝迁/192
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	
——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张广智/202
胡秋原的欧美史学写作	
——以《历史哲学概论》为中心	李 勇/209
毛泽东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究	
——从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谈起	贾庆军/216
确立颜李近代学术形象的努力	
——梁启超的颜李学研究	王学斌/226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史检讨	陈学然/238
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	彭 华/249
刘咸炘“察势观风”理论的重重解读	刘开军/260
1949年前后的柳诒徵先生	柳曾修/267
南北学风中的缪凤林	颜克成 兰永海/274
民国史学与宋学	
——以陈垣先生为例	牛润珍/283
从几则评论谈陈垣先生的史学	戴晋新/289
陈垣的历史人物研究初探	徐国利 李天星/298
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	谢保成/307
个人际遇与学术生态的互动	
——顾颉刚学术生涯的突破	马建强/319
陈槃的讖纬研究	梁秉赋/328
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	王 刚/333
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何晓明/345
论钱穆史观中的“现代眼光”	赖功欧/357
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兼论《读〈刘蕺山集〉》一文	张笑龙/369
朱怀天与钱穆的交谊述考	傅宏星/376

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乔治忠/383
从罗尔纲考证《李秀成自述》看胡适的考证方法	邹兆辰/396
罗尔纲和他的《太平天国史纲》	李欣荣/404
试论方甦生的学术贡献	庾向芳 汤勤福/414
黄文山“史则”、“史观”探讨中的学术与信仰	赵立彬/423
张荫麟及其“新史学”	刘俊峰 田 萌/428
徐复观治史渊源述略	邵 华 宋红宝/437
吕思勉的古书体例研究	俞 达/447
“区析类例助攻错”:孙德谦的古书体例研究	赵 争/452
《文史通义》的两种注本	张京华/457
叶长青《汉志》研究述评	彭丹华/469
从李济《新郑的骨》谈起	张童心 王效玮/475
天地之变:遗老眼中的辛亥革命	
——以叶德辉为例	张晶萍/480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	
——《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刘 巍/485
中国学术的千年变局	
——读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	张美娣/494
评《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	张承宗/499
史学转型与变革视域下的民国史学	
——“民国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 勇 邵 华/501
后 记	507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朱发建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近代西方同时并行的两大学术思潮,深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近代中国史学,很大程度上也笼罩在这两大思潮之下。在国弱民穷、被动挨打的严酷现实逼迫下,中国史家出于“经世致用”的应世诉求及追赶世界史学潮流的急切愿望,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导引下,自20世纪初叶起,即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①

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流行,也导致了“科学”的异化,科学在“主义化”之后,被作为真理的化身,蜕变为独断的权威。科学与人文在近代以前曾以统一的形态存在,近代以后,随着科学的泛化与“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科学与人文开始由合而分,在知识领域引发了二重知识、二重文化、二重领域的疏离和对峙,从而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在近代史家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时至20世纪20年代,在科学史学如日中天之时,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衡》诸子,对史学的“科学性”有所疑虑,渐产生史学不必为“科学”的观念。人文主义思想自《学衡》诸子大力倡导之后,渐与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结合,并援西方直觉主义哲学为助,自30年代后,中国史家对史学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在区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梁启超将史学定位于“社会科学之一种”;何炳松、徐珏清提出史学既非自然科学、亦非社会科学的观念,但仍不失为一种“科学”;钱穆、朱谦之等史家提出史学的“人文性”特征。到40年代,随着《思想与时代》杂志介绍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想,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遂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国史学开始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综合史学之路。

一、义理与考据并重的史学观

科学主义史学强调历史考证研究,排斥“义理”。钱穆通过对近代科学化史学(包括“科学考订派”与“宣传革新派”)的反省指出:近人治史,考据与义理两分,治考据者绝不谈义理,谈义理者绝不言考据。而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与义理并非截然两途:要明义理,有待于考据;从事考据,目的在明义理,“合则双美,分则两损。”考据只是做学问的手段与方法,学术研究终当以义理为依归,“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②即提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治史观。

人文主义史家重视哲学与历史理论。常乃德即提出:历史学研究不能没有哲学,否则历史学没有灵魂,“普通历史学者多以为历史的任务仅在照历史真相加以描述,而不察事实与叙述之间存有许多不可越过的障碍,即其间存有认识事实真相的可能与否问题。此问题若不注意,则所有历史记载无论所用方法如何精确,俱难免于盲人摸象之讥。”因为他相信,研究人事问题须以哲学观点作指导,故史学家须有史观,“史观就是我们人类对于过去自己所作成的历史的一种系统的理解。”以此来衡量近代的史学,“自近代科学的历史发达以后,

^① 参见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钱穆:《学术与心术》,收入氏著《学衡》,香港自印本1958年,第140、145页。



大家误以为考订史料就算尽了史学的能事,所以越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去。殊不知历史考订的工夫无论做得怎样深,充其量不过对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上有点功劳,只能叫做史术,还不够称为史学。”“只有哲学和历史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生。”历史学“必须对于历史这一件整体事实加上点理解作用,才能叫做史学。”^①朱谦之也指出:“现代史学已经是从故事式的历史进到教训式的历史中,现代史学又以所谓社会史、经济史为中心,而一说到社会史、经济史,则各种社会史观、唯物史观,不是很显出这些各种史观的抬头吗?所以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只有最笨不过的傅斯年一派,才来反对历史哲学。”认为他们“憎恶历史理论,实在因为他们缺少理论的能力。”^②

以历史观解释历史,也必须选择科学的历史观。缪凤林说:“哲人史家各异其解释,遂成各种不同之史观。”^③但传统伦理道德史观及其他史观不能正确解说历史问题,郑鹤声批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史观,“我国史旨重在义理的评判,以道德衡是非之标准,而其目的全在树之风声,故可谓之道德的史观或伦理的史观,与今新史学之义,大相径庭。”^④张荫麟批判中世纪宗教史观,对黑格尔理性史观也同样以科学理性批判,认为“如此神话式之空中楼阁,吾人但以‘拿证据来’一词,便足以将其摧毁无余。”^⑤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现代历史观也有了变化,其中有可以借鉴于观察人类历史的史观。陆懋德指出19世纪以来欧洲史观众多,无非“唯心及唯物两大派”,“然今日之研究社会科学家,已多趋于唯物一途。”他认为历史变化是复杂的,取用任何单一的史观都不能圆满解释,因之唯心、唯物史观不可偏用,偏于唯心则流于玄虚论,偏于唯物则有机械论之弊,合理的方法是博采众史观之长,对历史作综合性解释。^⑥

通过对各种历史观的评述,大体肯定近代产生的“科学”史观(如历史进化论、唯物史观)有超越于旧史观(如循环论、退化论、伦理道德史观等)之处,但也各有所偏。到30年代便有人提出综合各种新史观之长、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人文史观。潘光旦总结以前的历史,将其归纳为“唯神、唯人、唯物”三个范围。但他提出在“这三端以外,再不妨添一个唯文史观。”他认为,各种史观各有其适用范围,观察历史应综合运用,“大率生物学者与种族学者是唯人的,地理学者与经济学者是唯物的,文化学者与哲学家是唯文的。一个完全圆满的史观自然是这种种派别之和。”^⑦而人文史观就是沟通科学史观与唯文史观的代表。

二、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

科学史学重视历史实证研究,注重归纳、实验方法。梁启超在提倡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时就曾指出:科学上的“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对史事的理解“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⑧。已意识到治史应将“实证”与“直觉”方法相结合。此后中国史家在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努力上,创造出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结合的治史方法。

最典型的是陈寅恪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治史方法,强调史家通过辨物、析事的研究,通史实、明语境,达至与古人心意相通的境地。陈寅恪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

①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民主政治社,1948年,第212页。

② 朱谦之:《历史科学论》,《现代史学》1935年2卷3期。

③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④ 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学衡》1924年第33期。

⑤ 张荫麟:《论传统之历史哲学》,《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19期。

⑥ 陆懋德:《历史研究法》,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42页。

⑦ 潘光旦:《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人文》1931年第2卷2、3期。

⑧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

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意,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同时也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要达此境界,史家须具“通识”^①。陈寅恪提倡的这一治史方法得到许多学者赞同,吴宓即说:“近世研究古人古事,首重了解与同情。”二者之中,首先是了解,“未能了解,安有同情。”^②张其昀亦言:“吾人研究思想史,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③

熊十力从佛学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中总结出“证会”、“体认”诸方法,强调治学者要深造自得、达到与古人“心通意会”的境界,与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式的虚、实互证方法亦殊几近之。熊十力指出:“佛家确是由理智的而走到一个超理智的境地,即所谓证会。到了证会时,便是理智或理性转成正智,离一切虚妄分别相,直接与实体冥为一如。”达此境地,则“通内外、物我、动静、古今、浑然为一,湛寂圆明,这个才是真理显现,才是得到大菩提。”^④他认为这一方法与考据家之方法有根本区别,“此二之判,不止天壤,非真知学者,难与言此。考据家所穷之源委、所辨之流别、所析之名相,只依文甄述而已。”而证会之法,“其精研古学,凡所以识诣归、辨脉络、得系统、穷支流者,虽复即文字以妙会古人之意理,而其意理所由形著,实不可以守文而得。易言之,即通古人之意理者,必非徒在文字上着功,要自有所致力于文字之外者。唯其平日仰观俯察近取远观之余,反已以浚其源,即事而致其知,既已洞见本原,明察物理。”^⑤

这种“证会”方法有超越“科学方法”之处。熊十力认为科学方法只能获得事物表面现象的知识,“科学方法以实测为本。即玄想所及,特有发明,仍须验之于事物,方足取信于人,否则亦难自信也。……科学只能研究事物互相关系间之法则,故此等知识,只属于表层的,而不能证会实体。”^⑥因此,“科学无论如何进步,即如近世物理学,可谓已打破物质的观念,然总承认有外在世界。他们毕竟不能证会本体。毕竟不能通内外、物我、浑然为一。他们所长的还是符号推理,还是图摹宇宙的表层,不能融宇宙人生为一,而于生活中体会宇宙的底蕴。新物理学无法证会本体,旁的科学亦然。继今以往,各科学虽当进步,然其无法证会本体,当一如今日,科学的方法与其领域,终有所限故也。”^⑦

中国学术重“体认”的研究方法可弥补科学实证方法的不足。熊十力认为:“中国哲学有一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唯其如此,故在中国哲学中,无有像西洋形而上学,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存在的物事而推穷之者。西洋哲学之方法,犹是析物的方法,如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280页。

② 吴宓:《孔诞小言》,《学衡》1933年第79期。

③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④ 熊十力:《答唐君毅》,《十力语要》(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8、119页。

⑤ 熊十力:《答薛生》,《十力语要》(卷二),第39页。

⑥ 熊十力:《王准记语》,《十力语要》(卷三),第299~300页。

⑦ 熊十力:《韩裕文记》,《十力语要》(卷二),第199~200页。



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有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外界存在的物事,凭着自己的知识去推穷他,所以把真理看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实则真理本不是有方所有形体的物事,如何可以数量等等去猜度。”他认为人的生命与大自然都是宇宙生命的体现,而对人事的研究,不能如科学家那样将其作为外在于研究者的纯客观对象处理,只有依凭“体认”的方法,“真理毕竟无方所、无形体,所以不能用知识去推度,不能将真理当作外在的物事看待。哲学家如欲实证真理,只有返诸自家固有明觉,即此明觉之自明自了、浑然内外一如而无能所可分时,方是真理实现在前,方名实证,前所谓体认者即是此意。”这种体认之法,也正是儒家认识事物的方法,“儒者在其形而上学方面,仍是用体认功夫。孔子所谓‘默识’,即体认之谓。”“孟子所谓‘思诚’、所谓‘反身而诚’、所谓‘深造自得’,亦皆体认也。”“由儒家之见地,则真理唯可以由体认而实证,非可用知识推求。”^①

三、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

在看待史学研究的目的上,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史学“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本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理念,“为研究过去而研究历史”表达了那个时代史家的共同信念。王国维早即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②提出学术研究不当持“有用无用”之说,否则皆“不学之徒”。胡适认为,学术研究不当存“有用无用”的成见,“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③顾颉刚也说:“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④傅斯年更主张“学究式”的研究,“历史学和语言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⑤朱谦之针对傅斯年的主张说:“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等考据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这种治史观造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⑥因此,他在中山大学发起“现代史学”运动。30年代之后,有鉴于考据史学不重“实用”与价值、意义缺失之弊,且为日益险恶的时局所激,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受到质疑,史家开始将治史与人生修养、经国兴邦联系起来。

首先是学院派史家自我调整治学取向,注重“有意义之史学”。1934年顾颉刚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史地之学,宣称“所学必求致用”。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证明东北自古即为中国领土,批驳日本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抗战中“西南民族学会”有人考订出云南少数民族原本为“猺猺”,与泰国民族同出一源,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提倡“大棒主义”,煽动云南脱离中国与泰国联合,傅斯年见后直斥为“无聊之学问”,并批驳其“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⑦1943年陈垣在给方豪的一封信中谈到:“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⑧

① 熊十力:《答马格里尼》,《十力语要》(卷二),第126、127~128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215页。

③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7~328页。

④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⑥ 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1942年5卷1期。

⑦ 傅斯年:《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2449~2452页。

⑧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

学衡派在“求真”之外,强调治史不仅在求得关于过去的知识,终极目的是“致用”,小则修身济世,大则爱国爱种、振兴民族文化与精神,尤其提倡弘扬民族精神的治史主张。柳诒徵在《史学与地学》杂志“弁言”中说:“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①在《历史知识》中言:“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在《讲国学宜先讲史学》中说:“史断非繁重孤僻之学,而为最普通之学,与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他的治学主张批评考据史学脱离人生和社会实践,“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扣槃扞籥,削足适履,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土耳。”^②陈训慈也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③缪凤林阐述了史学的8种用处,提出:“史为经世之学,故以实用为归。”^④故他所主张的史学研究“较之时人之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同。”^⑤

钱穆也强调史学本为“通今致用”之学,不仅在考据事实。批评乾嘉考据“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用”;而近世科学考订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前现实无预。”在他看来,推动一国一族的历史发展力量,“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累积之成绩。”^⑥故历史学乃“生命之学”,历史的生命力就在于泳涵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故“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⑦其目的在振奋民族精神,在抗战中写作《国史大纲》的目的即在此,其一生学术即在“为中国文化招魂”。周予同曾指出:钱穆所持的即为人文主义史学立场,“钱氏站在‘通史致用’的观点,要求治史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出发点是情感的、公民的。”^⑧

四、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互渗

科学史家以科学家的“客观”态度为准则,要求治史应“排除自我”、绝对“客观”。梁启超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⑨傅斯年提出对史料要“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并宣称“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学之事业。”^⑩

缘于对历史研究对象特性的了解,许多史家对史料中主、客观交织的特点开始有较清醒的认识。何炳松指出:“学者每以为史料所载,即系事实,此大误也。”“夫史料所涵,乃撰人之印象,非事实之本真。”^⑪因为史料为史家所记所作,而作史者不免“好恶有偏”、或“自炫文彩”、或“心慕虚荣”、或“取悦流俗”诸病,甚至有“虚构事实,妄言欺人”者,故史料不即史

① 柳诒徵:《弁言》,《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③ 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1921年1卷2期。

④ 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史地学报》1923年2卷7号。

⑤ 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1929年1卷1期。

⑥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4页。

⑦ 同上,第11页。

⑧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3页。

⑨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2、44页。

⑩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第181、183页。

⑪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40页。



实。常乃德认为：“所谓科学化的历史决不是表册式的历史，也不是钞书式的历史和化石展览式的历史，真正科学的历史家，也决不摒弃主观的成分，决不鄙弃艺术化和伦理化对于历史著述的影响。”^①因为历史材料都是社会心理的反映，“事实之选择与淘汰其间常含有心理作用，即在目睹其事者之记载中，亦难免因主观之地位而歪曲事实真相。”史事是由“无数时代之社会心理作用累积而成。”历史事件是作史者“根据既成的诸多史实，以其天才加以联系，组成一完整的系统，使史实与史实间配合成一周密的体系，由此体系表现一种意义。”“故历史者非他，社会之心理反映也。”^②正是这一认识，使史家意识到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史家开始重视历史认识时的主体性作用。许多史家都认识到：不仅史家研究的史料中含有主观性，而且史家对史料、史实的选择也渗透了主体意识。张荫麟论及史家著史，选择何者“重要”时的去取，提出几条标准（新异性、决定性、实效性、文化价值、训海功用、现状渊源），都是随人、随时而变的，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③。因此，历史研究应发挥史家的主体意识。常乃德批评实证论者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绝对外在于人的客体，想要完全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似乎以为历史是摆在历史家对面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忘记自身去观察它，如同我们观察一个行星的轨道一样。但是事实上能否办到如此的绝对客观的地步呢？从相对论发现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是天文学上的观察，也不能脱离了观察者的地位而另有所谓绝对超然的不变标准，何况由复杂人事所构成的而历史家本身即属于其中一分子的历史呢？”他引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观点，从历史认识论角度提出，“吾人可知一切历史均属于现代的、创造的，过去者早已过去，决不能还原。伟大的历史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集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④

熊十力也重视主、客观交融，他说：“凡读书者，须有主观方面之采获，有客观方面之探求。先言主观，读者胸中预有规模，有计画，则任读何书，随在有足供吾之触类而融通者，若无规模、无计画，而茫然读古人书，读一书即死守一书之文义，读两书即死守两书之文义，是谓书蠹，何关学问？次论客观，某一学派之大著必自有其独到之精神，必自有其独立之系统，读者既有主观之采获，遂谓得彼之真、窥彼之全也，于是，必以主蔽客也。故必屏除一己所触类通融者，而对彼之宏纲众目为纯客观之探求，方见吾与彼之异，及吾与彼并其他诸家之异。益征道理无穷、宇宙无量，而免入混乱或管窥之消矣。”^⑤他以科学研究为例加以说明，科学研究虽“是纯客观的，实亦离不开主观的色彩。如物理学上之粒子说与波动说，毕竟不可征知世界的实相，而只是吾人主观上对于世界之一种图景。但科学总是力求避免主观的偏蔽与妄臆等等，而完全注重外在世界的事实的发展，所以说为纯客观的。”因此，“科学上真理一词，即谓事物间的法则”，“只限于经验界”；而玄学上的真理，“为绝对的真实”。^⑥

钱穆区分了历史、史料与历史知识的不同，认为“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以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为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所需历史的知识。”其中“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一经发生即为客观不变的事实，因此，研究历史必须有客观的态度；

① 常乃德：《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常燕生先生遗集》（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32页。

② 常乃德：《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常燕生先生遗集》（1卷），第257-260页。

③ 张荫麟：《论史实的选择与综合》，《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18期。

④ 常乃德：《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常燕生先生遗集》（1卷），第231、236页。

⑤ 熊十力：《答谢石麟》，《十力语要》（卷四），第44页。

⑥ 熊十力：《答唐君毅》，《十力语要》（卷二），第122页。

而史料是当时或后人的记录,“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而“历史知识”是史家对史料的解释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时代既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①因此,历史知识会随解释发展而变化,“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的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故“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②他本着对历史“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调治史者当用心灵去体悟,以主观体验与感悟认识历史,达到“与古为一”的境界。

自20世纪20年代起,经过科学史家自身的反省与其他史家的批评,对“科学化”史学优于旧史学之处及其末流弊端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到30年代中期后,史学界便有避害趋利、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1941年,周予同即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界“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和。”^③在这一进程中,缘中、西人文主义而兴的“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对“科学史学”的批评与反思,并非否定史学“科学化”的方向,而是倡导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史学新风,为中国史学“科学化”之路开辟了新的途径。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钱穆:《关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讨论》,《大公报》1934年4月21日。

②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第7~8页。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59页。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①

陈 勇 范玉亮

中国史学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呈现出了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对这一时期各家各派治史理论和成就得失的总结,不仅对于理解当时史学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可作为当下如何更好地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史学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本文不拟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全面考察,仅以这一时期主要的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为考察对象作一扼要叙述。

对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派别的划分,当时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划分版本。比如冯友兰有信古、疑古、释古三说(《古史辨》第六册“冯序”),杨宽有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的界说(《中国上古史导论》),钱穆有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的划分(《国史大纲·引论》),曾繁康分为考据学派、唯物史观派和理学派三派(《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周予同分为史观和史料两派,同时又把史观派细分为儒教史观派(经典派)和超儒教史观派(超经典派)两派(《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当代学者也有不同的划分,如张书学把中国现代史学(1919~1949)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三大思潮,认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占史坛,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四十年代后渐成主流(《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侯云灏把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保守派、史料学派、生机史观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十二个流派(《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盛邦和把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分为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五个流程和民族史学、批判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港台及海外学者也有不同的划分,如许冠三分为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等(《新史学九十年》),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中心工作(《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本文把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分为新考据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派,下面略作叙述。

20世纪前半期,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毫无疑问是新考据学派。该派又可分为两派,一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是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两派都是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下创生的。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用历史演变的眼光追求传说的演变”,“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在胡适的倡导下,1920年代前期有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异军突起,1920年代后期有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崛起史坛,成为了20世纪

^①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钱穆与20世纪中国史学”(项目号:12YJA770008)的资助。

前半期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

顾颉刚,江苏苏州人,是20世纪中国疑古史学的领袖。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顾氏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此说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如胡适,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①;钱玄同亦称赞顾说“廓清云雾”、“精当绝伦”^②,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疑古玄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如东南大学的刘掞黎、柳诒徵批评顾氏勇于疑古,疏于读书,“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奇得骇人”^③,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讨论,顾颉刚也因此名播学界。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结集出版,把中国古代的疑古辨伪思想推向了极致,同时也最终奠定了顾颉刚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从此,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个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学术派别——古史辨派,顾颉刚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该派的领袖人物。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者,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检讨,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抹去了笼罩在史学领域中的经学神秘色彩,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思潮之一。徐旭生称“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他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④不过该派以破坏伪古史为己任,在“立”的方面所作的工作不多,用周予同的话说,“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又,该派在治史方法上过份依赖“默证”^⑤,对古书怀疑过头,也“搞了很多冤假错案”。^⑥

史料学派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鹄的,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他的领袖和舵手是傅斯年。

傅斯年早年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熏陶,是《新潮》杂志的主编和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底,傅氏负笈欧洲,先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七年。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深受兰克学派历史语言比较考证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⑦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和国文、史学两系主任。1927年秋,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正式树起“科学史学”的旗帜,以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而名震学

①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来的史学书》,《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页。

②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③ 刘掞黎:《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一),第87页。

④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增订本),第23页。

⑤ 参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古史辨》(二),第271~288页。

⑥ 参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7期,第4页。

⑦ 傅斯年深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一点在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但他受西方哪一学派的影响更大,目前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傅斯年曾留学德国,受兰克学派治史方法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他回国后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历史、语言二者并举,提出“史学本是史科学”、“史学只是史科学”、“史学便是史科学”的主张,不难看出该派对他治史方法的浸染和影响。但傅斯年档案提供的材料表明,他早年的藏书中没有兰克的著作,而且在傅氏一生的著述中提到兰克的名字也屈指可数。据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材料之劫余残件》所载,傅斯年虽然在留德期间选修过语言学课程,但却没有成绩,这似乎表明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对他影响并不太大。桑兵认为傅斯年在留德时少读兰克的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资源,还不如当时国际汉学之都的法国巴黎学派影响更大。傅氏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其心目中的典范还是法国。参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术界。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后,他把该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为史语所招揽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而成为史料学派的舵手、新考据派的领军人物。

傅斯年主张“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客观地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其目的在于重建信史,所以有人又把史料学派称为“重建派”。傅斯年原本是主张疑古的,他的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并主张“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1924年1月到1926年9月间,在德国留学的傅斯年给顾颉刚写了一封长信(未寄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顾颉刚论古史”。在这封信中,他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极尽称赞:“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的造成的中国古史’”,“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您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颉刚在史学上称王了”,“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①

顾颉刚在史学上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对傅斯年的触动和刺激不小。他一方面对顾氏佩服得“五体投地”,称“颉刚在史学上称王了”,研究古史的人“终不能不臣于他”,另一方面对顾氏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当傅氏回国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正式跨入了史学这一领域时,他对古史辨派治史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也在作进一步的思考,逐渐由“疑古”转向了“重建”。^②

傅斯年与顾颉刚由同道转为对手,由疑古转向重建,与二人争胜之心不无关系,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与古史辨派只破不立,疏于建设有关。傅斯年在史语所专设考古一组,把田野考古定为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在他的倡导、主持和策划下,以史语所为主体的中国考古学家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宣告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而且也使甲骨学和殷商史成为时代的显学。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考古发掘的直接材料来研究历史,从而使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面貌为之更新。

钱穆晚年曾把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派概括为疑古、考信两派,他说新文化运动中“疑古辨伪”之风皆承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起,“既为‘疑古辨伪’,则必有‘考信’工作,而新文化运动同时又有殷墟发掘及龟甲文研究。此则‘考信’与‘疑辨’之两翼并进,双轮齐前,亦成一不可分之势。”^③杜正胜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20世纪中国的古代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气候之外有两大主流,一是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派”,另外一个主流则是傅斯年所代表的“重建派”。^④在这两大主流史学阵营中,史料学派的影响后来居上,声势盖过了古史辨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把20世纪中国的实证主义史学推向了顶峰,成为当时主流史学派中的主流派。随着史语所迁台和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该派学风在台湾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杜维运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史学界,“考据仍然是史学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完全是笼罩在考据风气之下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与考据有极深的渊源,学术著作的审察以及奖励,也以其是否有考据分量作最重要的标准之一”。^⑤

①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6~447页。

② 参见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③ 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6页。

④ 参见杜正胜:《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学》,收入氏著《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219页。

⑤ 杜维运:《二次大战以后我国的史学发展·引言》,载《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第51页。